

士大夫的逸樂—— 王士禎在揚州 (1660-1665)

李孝悌*

王士禎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禎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禎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禎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美國學者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禎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在本文中，我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以王士禎在揚州五年 (1660-1665) 的仕宦生涯為基礎，探討一位文人／士大夫在清初江南生活的全貌，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詩人角色的轉換，以及與前朝遺民、布衣文人、當朝官員的交游網絡。我也將討論他日常的詩酒酬酢、宴游活動及對揚州與江南景物的流連。和過去習慣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取徑著手，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不同的是，本文將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為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提供另一個詳細的個案和新的視角。並希望透過士大夫個人豐富的生活經驗，來重建一個和現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風貌和生活型態。

關鍵詞：王士禎 揚州 士大夫文化 生活史 逸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爲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爲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¹ 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² 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³ 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或是對他的主要詩歌創作理論「神韻說」提出批判和疏解，自然就成爲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⁴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素材。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範例。⁵ 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爲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⁶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禛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以

¹ 黃叔琳，〈漁洋山人本傳〉，見《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補》，收入孫言誠點校，《王士禛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12。

² 蔣寅在《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一書中，分析了王士禛如何受到錢謙益的啟發、獎掖，最後取代錢成為清初詩壇的盟主。頁1-23。

³ 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187-201。

⁴ 「神韻說」基本上是指一種沖和淡遠的創作風格，講求飄逸的情境和意在言外的文字。王士禛的理論和詩作雖然在清初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在當代就已經引起一些批評，批評最力的是和他同時的詩人趙執信。趙執信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進士，才十八歲。但二十八歲時因為在國喪期間搬演《長生殿》一劇而貶官。此後一生抑鬱，詩作充滿了悲憤之氣。趙四十八歲時，寫成《談龍錄》一書，正式向王士禛的「神韻說」提出挑戰。詳細的討論，見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上冊，頁585-630。徐振貴對趙、王二人的差異有比較持平、簡扼的分析。他認為「清遠為尚」並非神韻說的全部內容，神韻說也不是漁洋的全部詩論，漁洋詩中也有一些寫實性的作品，見〈趙執信與王士禛詩及詩論評辨〉，《齊魯學刊》1995.2：91-96。近來的其他研究也指出王士禛的神韻說並不排斥「沉著痛快」的美學特徵。他的詞雖然以婉約派為不祧之宗，但也不鄙薄、排斥豪放派，見張少康，〈董其昌的畫論和王漁洋的詩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2：43-46；蔣寅，〈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文學遺產》1996.2：91-99。

⁵ Tobie Meyer-Fong,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0.1(1999): 49-84。本文由董建中譯為中文，〈綠楊城郭是揚州——清初揚州紅橋成名散論〉，《清史研究》2001.4。

⁶ Meyer-Fong, 前引文，頁53, 58。

及與文人故交的宴飲狂歡，都將一一觸及。在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些人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在型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⁷ 王士禎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幅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禎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⁸ 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禎，應該是躊躇滿志的。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禎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地接受。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禎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等到選中揚州推官，才了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1660）——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康熙三年，1664）十月才遷為禮部主客司主事。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士禎在崇禎七年（1634）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他因此結論道：「諺云：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⁹

⁷ 李孝悌，〈在城市中徬徨：鄭板橋的盛世浮生〉，收入《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即將出版。

⁸ 《年譜》，頁13-14。

⁹ 《年譜》，頁15-16。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冊，卷二二，〈籤驗〉，頁528。

王士禎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祕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和王士禎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跡，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¹⁰ 王士禎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跡；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年譜》的一開頭，就以一種魔幻的筆法，追溯了自己家族的起源和興盛之由。¹¹ 晚年評論王氏三代在學業、仕途上的輝煌成就時，也歸因於祖父在選擇先人墓地時的洞見。神祕的經驗，成為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¹²

¹⁰ 我在〈袁枚與十八世紀中國傳統中的自由〉（收入《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一文中，有簡單的討論。

¹¹ 《年譜》一開頭，王士禎記述自己的先人瑯琊公在元末避居新城，為某大姓傭作。「一日大風晦冥，有一女子從空而墮。良久既霽，公於塵垢中得之，云即諸城縣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瑯琊公遂與天降的初氏女結為夫婦。「兩百年來科甲蟬連不絕，皆初夫人所出也」。見《年譜》，頁1。

¹² 王士禎對科舉、功名和神祕力量間的關係，有很大的興趣。在談到自己這一房在學業上的輝煌成就時，認為都是因為祖父王象晉選擇了一塊「吉壤」來埋葬先人。相反的，伯祖王象乾雖然也篤信風水，並常常在家裡招待堪輿師，卻因為選錯了地方，竟致無後：「先祖方伯贈尚書府君與伯祖兵部尚書太師府君為胞兄弟，太師篤信堪輿，家常有數輩在客舍，方伯常非之。自卜兆域於高祖忠勤公塋之西，恆語先贈尚書初，至此地，覺足下步步如登高然，然實平地耳。心以為吉壤，即決意用之葬兩祖母夫人。而太師所擇在淄川縣北，距新城六十里，竟無後。方伯子孫眾多，愚兄弟同胞四人，三人成進士。府君初贈戶部左右侍郎，累贈刑部尚書，皆帶經筵講官。」見王士禎，《分甘餘話》（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870冊），頁551。《居易錄》中也記載了一個學生的先人，致力挑選風水的過程：「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堪輿之說非所論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他的門人吳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吳曷的曾祖吳體泉為了替他自己的父親找一片洞天福地安葬，特別請了一位通風水的福建人簡堯坡到家裡，給予豐富的酬勞。簡堯坡尋覓了三年都找不到好的地點，幾乎就要放棄。後來在一個叫陳家市的酒樓喝酒，「倚檻遠眺，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兩度前往探視後，簡高興地歡呼：「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並預言：「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對面文峰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第三人。亦不僅一世而止。」後來果然一一應驗。王士禎聽了學生的故事，讚歎道：「簡之術亦神矣！」王士禎，《居易錄》（收入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66冊），卷一〇，頁387-388。

順治十七年初，王士禎啓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爲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¹³ 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靡靡卽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¹⁴ 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禎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禎，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根據他的老友汪琬 (1624-1690) ¹⁵ 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爲然，認爲以王士禎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爲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爲詩，吾不信也。」¹⁶

事實證明，王士禎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爲之治。揚州五年任內，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

除了在筆記中記載學生顯赫神奇的家世，他也在墓誌銘中，記敘自己的同僚山西道監察御史傅宸（彤臣）的特異能力和經驗：「公平生多神異。諸生時，有巫覡爲社鬼所憑，公至即避去。曰：傅公，正人也。辛亥冬，公得寒疾，危甚，夢觀音大士，以甘露灑其頂曰：君至孝格天，當延壽一紀。已而脫然，又十二年而公歿。」王士禎，〈教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彤臣傅公墓誌銘〉，見《漁洋山人文略》（以下簡稱《文略》。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第54冊），卷八，頁179。

¹³ 王士禎的祖父王象晉，崇禎年間曾任揚州兵備副使，見《年譜》，頁4, 16。

¹⁴ 王士禎，〈澠水上留別家兄太液禮吉子側暨諸猶子二首〉，見《漁洋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以下簡稱《四庫存目》。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部第226冊），卷七，頁612。

¹⁵ 汪琬和王士禎同在順治十二年中進士，以古文名家，詩學宋調。但他性嚴厲，不輕許可。所以人多舍汪而就王，謂「如坐春風中也」。參見蔣寅，〈王漁洋事跡征略〉（以下簡稱《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34。宋華，〈誥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阮亭王公暨元配誥贈夫人張夫人合葬墓誌銘〉，見《年譜》，頁110。蔣寅的《征略》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一本關於王士禎的年譜，對王漁洋的事跡、交友、作品有詳實的整理考證，對本文的寫作有極大的助益。

¹⁶ 汪琬，〈贈王貽上序〉，見《鈍翁前後類稿》（收入《四庫存目》集部第227冊），卷二四，頁614。

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王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耳食者徒以公爲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¹⁷對不明就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游，都讓人懷疑他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文人。但對和王士禛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游裕如的轉換。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士禛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他生活、情感的各個面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先是，順治十六年（1659），王士禛到任前一年，鄭成功率領的軍隊進犯長江沿岸，直抵鎮江、包圍金陵，東南人士群情振奮。明鄭軍失敗後，清廷開始追查江南各府州縣之迎降鄭成功者，株連極廣。¹⁸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王士禛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因此活人無算。¹⁹

王士禛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作風，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應，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鑄級。」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計也。」王士禛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²⁰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禛感到極度的沮喪。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爲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沉任之耳」。²¹壬寅年（康熙元年，1662）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弟近況益惡，非筆札所能悉其萬一。庾子山云：『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棧豆寧復

¹⁷ 〈漁洋山人本傳〉，見《年譜》，頁114。

¹⁸ 張宇聲，〈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淄博師專學報》1996.1：50。

¹⁹ 《年譜》，頁17-18。

²⁰ 《年譜》，頁20。

²¹ 冒辟疆，《同人集》（收入《四庫存目》集部第385冊），卷四，頁73a-b，總頁170。

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²² 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鬱，無復人理」。²³ 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同樣的怨懟，在康熙三年又出現了一次：「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殆如少陵所云：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²⁴ 此處所說的事事拂逆，可能和長兄士祿作考官時監督不周，因而下獄有關。王士祿是順治九年 (1652) 的進士，康熙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以磨勘里吏議，逮下獄」。²⁵ 士禎因為不能代兄赴京申冤而感到無限的愧疚，這點下文還會提及。

另一封寫於康熙元年五月的書信顯示，王士禎不但感到人生了無生趣，甚至和妻子及二哥士祐（字子側）一起開始長齋事佛：「弟與子側及內人悉已長齋奉佛，鶴柴竹亭，蕭然僧舍。」²⁶ 雖然這封信並未說明吃長素的理由，但從時間來推斷，很可能和仕途上的挫折有關。對王氏兄弟來說，在仕途遇到困頓時吃齋禮佛，似乎成了標準的應對模式。康熙三年，王士祿被罷官議處時，王士祐正好因為省試下第，留在京師。一家人過著疑懼困窘的生活，「皆震怖雨泣」。只有士祿坦然以對，每天靠著寫經和茹素維持心理的平靜。他還寫了一首長齋詩，說明因由：「我從憂患來，每食惟茹素。」又特別請人畫了一幅「長齋繡佛圖」，²⁷ 在苦難中表達出虔誠的宗教信仰。

二、官員／詩人的角色轉換

王士禎的挫折感固然真實而強烈，但和自己的兄長、同儕，或是揚州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鄭板橋）相比，王的仕途其實相當平坦順暢。從私人信函中，我

²² 這封信下註為辛丑（順治十八年，1661），似乎是降級前二年的事。但這封信的前一封信標明為壬寅九月，下封標明為壬寅秋。所以我推測這一封信可能也是壬寅年寫的。見《同人集》卷四，頁75a-b，總頁171。

²³ 《同人集》卷四，頁76b，總頁171。

²⁴ 這封信標明為甲辰年作，見《同人集》卷四，頁79b，總頁173。

²⁵ 〈王士祿傳〉，收入《清史列傳》卷七〇，引見《年譜》，頁132。王士祿的年譜，則較詳細地記載了他在康熙三年所受的懲處：「三月，以禮部摺摭試文語句指為有疵，考官例奪俸三月，而是時功令加峻，遂下先生吏部。五月，移刑部。」見王士禎，《王考功年譜》，收入《年譜》，頁76。明清的科舉考試，禮部依規定會派人對鄉試、會試的試卷，進行覆核，檢查詞句書法是否符合規定，謂之磨勘。

²⁶ 《同人集》卷四，頁74b，總頁170。

²⁷ 《王考功年譜》，見《年譜》，頁76-77。

們看到他偶爾宣洩的幽暗情緒。但在眾人的描述中，他卻總是以一種從容、優雅的姿態，出入在兩個不同的場域。在這個人人讚歎的公眾形象中，我們看不到一絲前述的陰霾情景。他的長兄王士禎所說的：「貽上蚤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²⁸ 可以說是對這種公眾形象最恰當的詮釋。

爲了避免大量詩詞作品和頻繁的酬唱宴游所可能引起的誤解，王的讚譽者在描述他的文化活動時，必先強調揚州的難治和他在政務上的傑出表現。惠棟首先就在《年譜》中記錄了王士禎爲彌補揚州積欠朝廷稅賦所作的努力。從順治二年(1645)到十七年，揚州積欠的稅款有兩萬多兩，許多官員和官員的親族因此下獄，「囹圄填溢」。王士禎看到這些多半因爲株連下獄的人「鳩形鵠面」，心中不忍，行文他的上司、下屬，希望藉眾人之力，彌補這些虧空。這些人多半曾經在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的軍隊攻打長江下游時，無辜牽連入獄，²⁹ 因爲王的搭救而平反，所以慷慨解囊，協助將揚州積欠的稅款繳清，繫獄的人犯也因此得到釋放。惠棟藉此來說明揚州推官的難爲：「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³⁰

冒辟疆則用鮮活、誇張的筆調——所謂「侍史十餘人手腕告脫」——描述王士禎異乎尋常的辦案效率：

廣陵爲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臬，藩臬復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史十餘人手腕告

²⁸ 見《年譜》，頁23。王士禎生前的自撰年譜，記事比較簡約。雍正年間，他的門人惠周惕的孫子，知名的考據學者惠棟也寫了一本《漁洋山人年譜》，對王的生平事跡作了許多補充。後來兩本年譜合而為一，成為今天看到的《王士禎年譜》，本文中引敘的一些讚譽之詞，都是惠棟後來補敘的。

²⁹ 《年譜》中對此事的記載是：「先是海寇犯江上，宣城、金壇、儀真諸邑有潛謀通賊者。朝命大臣讞其獄，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頁17-18。

³⁰ 《年譜》，頁27。雍正年間正式提出「衝、繁、疲、難」四個標準，作為判斷府州縣和地方官員缺等級的依據：「地當孔道曰衝；政務紛紜曰繁；賦多逋欠者曰疲；民刁俗悍，命盜案多曰難。」用這個標準來看，王士禎居官時的揚州，至少具備了衝、繁、疲三個標準。事實上，在順治十二年對府州縣所做的三等區劃中，揚州也因為「政事殷繁」、「地方扼要」，而和其他二十九個府並列全國一百多個府缺中的「最要者」。相關的討論，見劉錚雲，〈「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176, 178。惠棟說的「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或其他記載中的「廣陵爲江南劇郡」，顯然都不是文學修飾之辭。從「羽書旁午，征檄雨至」之類的描述和揚州所積欠的稅款，不難看出揚州被視為「劇郡」的原因。

脫。嘗以數月完欵件數千，一時齟指，推為神異。夜分入寢食，燃巨燭剖析案牘，不少休。³¹

更讓人羨慕的是，王士禛在繁劇的公務外，又同時扮演了一個出色文人的角色。在到揚州赴任前，對他多所鼓勵的汪琬，在為其詩集作序時，不只一次地稱讚他的絕才：「貽上自蒞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為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襍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獻歌之樂。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³²

從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王士禛在三年間寫了三百多首詩，數量驚人。陸圻在為這三年的詩集作序時，也一再將他在政事上的表現和「卓爾不群」的詩作相提並論。王士禛在廳堂上手題唐人的詩句「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裡見人家」，來表明自己的風格，陸圻進一步引申，說他「雖案牘旁午，常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正是因為詞人兼法吏的雙重角色，才使王士禛的詩作成就，超乎一般的尋常文人。³³

陸圻認為王士禛的許多詩作都是在公餘後，「吏散人稀」之際，在一種「焚香掃地，門逕蕭然」的幽靜環境中寫成。³⁴但其他的記載，多顯示王是在與賓客酬酢宴飲的熱鬧場合中揮灑成篇。惠棟的《年譜》在描述完王繳清揚州的積欠後，緊接著說：「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公事畢，則召賓客汎舟紅橋、平山堂。酒酣賦詩，斷紈零素，墨瀋狼藉。」他並同意吳梅村（偉業，1609-1671）的描述：「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是如實的記載。³⁵

³¹ 《年譜》，頁28。

³² 汪琬，〈王貽上石門詩集序〉，收入《鈍翁前後類稿》卷二九，頁3b-4b，總頁651。

³³ 陸圻，〈阮亭壬癸甲詩總序〉，收入王士禛，《漁洋山人集七種》（乾隆年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一），《阮亭壬寅詩》，頁1a-1b。

³⁴ 同前，頁1a。尤侗的序中，也特別強調王士禛在公事之餘的幽雅步調：「揚州東南一大都會也，官其地者，車馬相撞，板笏相接，判事之不遑，何遑高賦哉？乃阮亭岸幘嘯詠，終日不輟，一似杜門卻軌，幽居無事者之所為。」尤侗，〈序〉，《漁洋山人集七種·一，阮亭壬寅詩》，頁2b。

³⁵ 《年譜》，頁27-28。

吳梅村「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形容，簡捷有力地點出王士禎五年揚州生涯的梗概。同樣以詩作稱雄文壇的吳偉業，此時雖然已是遲暮之年，但他和錢謙益一樣，對這位後生晚輩的才華，給予高度的推崇。他在另一個場合，對王士禎白天／夜晚的兩種角色，作了更詳細地記載：

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材也！」³⁶

在眾人的交相傳頌之下，王士禎「刻燭賦詩」的浪漫不羈，就和他日理繁劇、酬應若流的神異能力一樣，成為揚州城的一種傳奇。而他顯然也樂於日以繼夜地在兩種身分間流轉。在現有的記載中，大概只有兩三次因為公私繁忙，而露出疲態。一次在順治十六年，他說自己「三四日來應酬判牘之外，聽斷日至十餘件，寢食不遑」。³⁷ 一次在康熙四年（1665）春天，他到如皋參加眾人在冒辟疆水繪園舉行的修禊盛會，先是因為有堆積如山的公務要處理，而婉拒冒辟疆的邀約：「昨夕暢聆樂君之論，不獨聲色絲竹之妙也，謝謝。連日簿牒如山，稍一料理，以便明日赴曲水之招，甘金谷之罰。今日萬不能躡屐，奈何！」接著，在四個晚上的徹夜清談和白天繁忙的公務後，因為體力不支，頭腦混沌，只好再次告假：「連日夜坐幾于達旦，又以公事迫促，幾不成寐者四夕矣。今日佳招，本擬趨命，并踐鑒賞書畫之夙約，乃頭目岑岑，殊不可耐。辭則非情，赴又不能勉強，奈何！奈何！」³⁸

因為公務的需要，王士禎在揚州任內，有不少機會往來於鄰近的城市。即使在這樣來去匆匆的旅程中，他也不忘同時扮演好官員／詩人兩種角色。像水繪園修禊這種「頭目岑岑」的狼狽光景，只能算是特例。多半時候，他都能利用公出之便，好整以暇地遊山玩水：「予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于金陵、京口、梁谿、姑蘇諸名勝，皆于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濡滯者。」³⁹「每讞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谷瓦官諸寺，城

³⁶ 這是吳偉業為程康莊《自課堂集》寫的序，引見蔣寅，《征略》，頁124。

³⁷ 《同人集》卷四，頁72a-b，總頁169。

³⁸ 這兩封信都收在《同人集》卷四，頁81b-82a，總頁174。

³⁹ 《居易錄》卷四，頁156-157。像王士禎這種利用公餘之暇遊山玩水的作法，並非特例。根據巫仁恕的研究，從晚明開始，旅遊之風大盛，地方官利用公餘之暇四方宦游的現象，成為士大夫旅遊文化中的一個主要模式。詳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8-103。

南高座、長干諸古刹，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⁴⁰ 這些在揚州境外「探幽訪古」的活動，成為王士禛此時詩作的主要內容之一。⁴¹ 像是《過江集》、《入吳集》等結集的詩篇，都是這個時期遊覽的成績。康熙三年十月，王士禛「有事於江寧」，事後遍訪金陵一帶的名山古刹，並寫了許多篇遊記和記敘文字。劇作家尤侗在為這一卷題名《金陵遊記》的文集作序時，盛讚王的文字成就超越了謝靈運、柳宗元。他的旅遊原本只是自己公餘之暇的賞心樂事，但他的文字記敘卻成為山川的幸運：

山川文字每有不相遇者，豈非恨邪。獨阮亭使君官于揚州，既領竹西瓜步之勝，而金陵鐵甕襟帶左右，江聲山色應接不暇。使君以參衙餘日，扁舟兩屐相羊其間，搜幽剔險，一一載之子墨，蓋兼謝、柳所不能兼者，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⁴²

三、士大夫的逸樂

除了暢遊江南的名山古刹，和文士故交的宴飲雅集也是王士禛閒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康熙三、四年的紅橋修禊和水繪園修禊，更成為王士禛五年仕宦生涯中值得特別銘誌的重大事件。修禊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經常舉行的文人聚會，不僅因為它是偶一為之的盛事，同時也因為它營造出一種情境，讓酬酢、宴飲和其他的藝文活動，能以一種更精粹而密集的方式，紛然並陳。參與者或是因為活動的規模，⁴³ 或是因為活動的強度，好像真的經歷了一次洗禮，留下畢生難

⁴⁰ 《年譜》，頁18。

⁴¹ 王士禛在〈阮亭壬寅詩自序〉中，說自己自丙申（1656）到辛丑（1661）六年之內，共寫了一千二百多首詩，詩中記載了這六年的「居處、游宴、友朋、贈答、山川之流峙、宮闕之偉麗、風煙草樹、江湖霜雪之變態。」見《漁洋山人集七種·一·阮亭壬寅詩》，頁1a。

⁴² 尤侗，〈金陵遊記序〉，見《漁洋山人集七種·七·金陵遊記》，頁5a-b。

⁴³ 由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主持的紅橋修禊，據說有七千多人參與。戴震、惠棟等知名的考據學家都是座上客。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一〇，頁229-230。Meyer-Fong 認為盧見曾以同樣在揚州任官的王士禛為楷模，不斷藉著修禊、詩文出版等活動來強化他和王的同一性，見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4. 盧見曾對王士禛的認同，和下面即將討論到的王士禛對蘇東坡的認同遙相呼應，揚州的文化傳承和系譜透過這些知名的官員／士大夫而綿延不絕。

忘的經驗。而透過文字的記敘、傳頌和後人的追憶、渲染，這些文人雅集的意義，又從個人生活中的高峰擴展成清初文化史上的盛事。

水繪園是冒辟疆在揚州府如皋縣長期經營的祖傳園林，地富水竹，入其中者如遊深林大壑。⁴⁴ 在王士禎的記敘中，美酒、佳餚，共絲竹管絃、山光水色，讓這一次告別江南的盛宴蕩漾無限狂歡的色彩。雖然這八首詩像是一句一典的奧義之書，將所有不諳符碼規則或經典傳統的外邦人摒除在門牆之外，但透過像惠棟這樣淵博的考據學者的導引，我們卻仍然能夠穿越華麗、炫耀的文字迷宮，進入清初士大夫極度雅緻的文化世界之堂奧。重重屏障的符碼一旦破解，三百多年前的歡愉立刻毫無窒礙地躍湧而出。在對詩作的時空背景作了簡單的交待後，（「今來三月青春深，浯溪窈窕桃花林」），王士禎毫不遮掩地引用明儒楊慎酒後「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諸妓捧觴，遊行城市」的典故，⁴⁵ 為暮春三月的這場狂歡定了基調。而這種痛飲狂歌的少年之遊，必定會在眾人各奔前程之後，留下鮮明的記憶：「春衣明歲杜陵遊，憶汝狂歌拓金戟。」⁴⁶

水繪園中雖然吃不到洛陽的羊肉、乳酪，卻有南方初春的時鮮菜蔬：「未傳洛下羊酪法，且醉淮南櫻筍廚」，⁴⁷ 更重要的，有著新造的醇酒佳釀：

暮春三月為水嬉，棠梨葉大山禽啼。田家社酒壓缸面，雪白橙香玉練槌。夜聽醉頭滴春雨，曉報提壺如潑乳。醉鄉大戶百分空，起喚花奴自搗鼓。⁴⁸

對王士禎來說，至此而不醉，那簡直辜負了滿園的春光。而賓主展卷靜觀之

⁴⁴ 金鎮，《揚州府志》，引自王士禎著，李毓笑、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以下簡稱《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上冊，頁478。

⁴⁵ 楊慎（用修）酒醉後種種狂癲的作為，引起友人的側目，加以規勸，他回答道：「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王士禎據此而寫道：「不怪老顛裂風景，名園上日相逢迎。」詳見惠棟的考證，〈上巳辟疆招同邵潛夫陳其年修禊水繪園八首〉，《集釋》，頁481。

⁴⁶ 見《集釋》，頁481。

⁴⁷ 見《集釋》，頁480。

⁴⁸ 根據惠棟的註釋，「缸面」即初熟酒，「玉練槌」則是唐朝美酒：「唐時造甘醴，名玉練槌，入口香美」。「潑乳」指的是酒，惠棟在註釋中引用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岑參，〈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詩則說：「花樣玉缸酒如乳」。「大戶」指的是虛構醉鄉中的「有飲材者」。「花鼓」的典故也來自唐朝，根據金榮的註，典出南卓，《羯鼓錄》：「明皇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見《集釋》，頁484-485。

際，千年前王羲之蘭亭修禊的場景，彷彿在水繪園中再度展演：

西豪里中訪老友，況復陳生與我厚。辟疆園敞羅群賢，大兒小兒唱銅斗。煙際鷗鷺一隻飛，吳歌水調欲沾衣。風光如此不成醉，帽影鞭絲何處歸。⁴⁹

迴溪綠淨不可唾，碧蘿蔭中棹船過。落花遊絲春晝閒，獨許先生此高臥。劇憐風物共披襟，蕭然絲竹皆清音。永和三日今千載，坐使清風滿竹林。（時出文衡山《蘭亭卷》同觀。）⁵⁰

從詩後的自註中，我們知道主客一行在園中觀賞了以蘭亭修禊為主題的畫作。收藏這幅作品的冒辟疆在〈水繪菴修禊記〉中，則有更進一步的描述：「枕煙亭几上有文待詔〈蘭亭修禊圖記〉一卷，卷素朱黠碧隱，茂林修竹，羃歷嫵媚，展玩如與王、庾諸子弟捉麈面談。」⁵¹

茂林修竹、山水清音⁵²和寬廣的園庭，為士大夫的雅緻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時空氛圍。⁵³不過在雅靜的藝術鑑賞和蕭然絲竹外，悠揚的樂音——不論是吳歌水調或銀箏、琵琶伴奏的戲曲演出——同樣是水繪園雅集的元素。冒辟疆對水上泛舟時的清吹數部和在園內寒碧堂中的戲曲演出，都有詳細的記敘：

登舟，泛洗鉢池。明窗盡開，水雲一色。一小蜻蛉載清吹數部尾其後，歌絲為水聲所咽，繞繞久之。⁵⁴

時日已將暝，乃開寒碧堂，爰命歌兒演《紫王釵》、《牡丹亭》數劇，差復諧暢。漏下二鼓，以紅碧琉璃數十枚，或置山顛，或置水涯，高下低

⁴⁹ 惠棟對風光一句的註釋是：張謂，〈湖上對酒行〉：「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帽影鞭絲」則典出陸游，〈齊天樂左綿道中〉詞：「寒月征塵，鞭絲帽影，常把流年虛占。」見《集釋》，頁482-483。

⁵⁰ 見《集釋》，頁484。

⁵¹ 見《集釋》，頁484。

⁵² 根據惠棟的註釋，這裡的絲竹清音典出左思，〈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見《集釋》，頁484。

⁵³ 王鴻泰曾分別從時間和空間兩種向度，對士大夫如何據以建立一個和庸俗、流行的俗文化相區隔的雅文化，作了極精闢的分析，見〈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發表於「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紐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02），待刊。他另外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城市園林和文人文化的關係，見〈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收入《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127-186。

⁵⁴ 見《集釋》，頁484。

昂，晶瑩閃爍，與人影相凌亂。橫吹聲與管絃拉雜，忽從山上起，栖鴉簌簌不定。阮亭曰：「此何異羅星斗而聽絃笙也？」

在這樣一個管絃拉雜的狂歡之夜，難怪王士禎要發出痛飲十石的豪語。⁵⁵

相較於水繪園修禊更具士大夫精英色彩的雅緻、考究，以揚州為背景的紅橋修禊，則除了旖旎的春光外，還多了一份對城市生活的描繪。

紅橋修禊先後舉辦過兩次。康熙元年，王士禎和陳其年等人修禊紅橋，並將酬唱詩文編成《紅橋唱和集》。康熙四年，再次舉行同樣的聚會，王士禎並賦成〈冶春詩〉二十首。⁵⁶ 在這些詩作中，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將三月的春光點綴得無限柔媚的桃花和垂楊：

今年東風太狡猾，弄晴作雨遣春來。江梅一夜落紅雪，便有夭桃無數開。

野外桃花紅近人，穠華簇簇照青春。一枝低亞隋皇墓，且可當杯酒入脣。

三月韶光畫不成，尋春步履可憐生。青蕪不見隋宮殿，一種垂楊萬古情。⁵⁷

同樣是隋宮和帝塚，在鄭板橋的詩作中呈現的是荒蕪衰敗的景象；在王士禎的筆下，卻用來為千古名城不變的春光，做了文化和歷史的裝點。在青春似火的桃紅外，如錦繡般盛開的海棠，更讓他不可自抑地在花前痛飲：

海棠一樹淡胭脂，開時不讓錦城姿。花前痛飲情難盡，歸臥屏山看折枝。⁵⁸

在與世隔絕的水繪園中，王士禎和遺老、名士把玩名畫，撩撥管絃，一幅晚明士大夫的頹廢景象。〈冶春詩〉則在韶光春色中勾勒出紅男綠女的身影，讓我們據以想像清初揚州的城市風情：

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闌干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⁵⁹

揚州少年臂支紅，桃花馬上柘枝弓。風前雉雛雕翎響，走馬春郊如卷蓬。⁶⁰

⁵⁵ 見《集釋》，頁481-482。

⁵⁶ 《漁洋詩集》中收集了原詩二十首，但在《漁洋精華錄》中，王士禎從二十首中選出十二首，成為今日習見的〈冶春絕句十二首〉。

⁵⁷ 《集釋》，頁386-387。

⁵⁸ 從惠棟和金榮的考釋中，我們知道海棠開花時，如胭脂點點，而成都的海棠又艷冠群芳。下面是三條相關的記載：放翁，《渭南文集》：「故蜀燕王宮海棠之盛為成都第一」。《格物叢話》：「唐《李贊皇集》：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海棠是也。花五出，極紅，胭脂點點，其有色而香者，唯蜀中嘉州為然。」放翁，〈見故屏風海棠有感詩〉：「成都二月海棠開，錦繡裏城迷巷陌。」見《集釋》，頁389。

⁵⁹ 見《集釋》，頁386。

⁶⁰ 這首詩並未收在後來選定的《漁洋精華錄》中，而是原來〈冶春絕句二十首〉中的一首，見《漁洋詩集》，頁666。

而市井中小販叫賣蜜糖的景象，也一定會像江城花事一樣，長留在回憶中：「東風花事到江城，早有人家喚賣錫。他日相思忘不得，平山堂下五清明。」⁶¹

紅橋富於山光水色、亭樹園林，原本就是一般遊客必定造訪的勝景：「遊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捨舟而陸，徑必出紅橋下。」王士禛也幾度登臨，哀喜莫名：「予數往來北郭，必過紅橋，顧而樂之。登橋四望，忽復徘徊感嘆。當哀樂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⁶² 而經過兩次紅橋修禊和文士唱和，不但紅橋聲譽鵲起，成為象徵揚州的名勝景觀，王士禛個人的姿容、才情，更被渲染成足以踵式前賢的傳奇。《年譜》中對康熙元年第一次紅橋修禊後造成的轟動有如下的記敘：「山人作〈浣溪紗〉三闕，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和者自茶邨而下數君，江南北頗流傳之。或有繪為圖畫者，于是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⁶³

王士禛的哥哥王士禛在第二次紅橋修禊後所作的評論，不僅對王士禛傳奇的出現有著動人的描述，事實上也是型塑這項傳奇的一環：

西樵先生云：「貽上蚤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為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于蜀岡、紅橋間，擊鉢賦詩。香清茶熟，絹素橫飛，故陽羨陳其年有：『兩行小吏豔神仙，爭羨君侯斷腸句』之詠。至今過廣陵者，道其遺事，彷彿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⁶⁴

王士禛在揚州推官任內的政績，固然為日後近四十年亨通的仕途奠下重要的基石，但在陳其年的回憶中，王為人艷羨不已的聲名，其實是在繁花盛開，充滿了頹廢氣息的詩酒流連中建立起來的：

官舫銀鐙賦冶春，廉夫才調更無倫。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⁶⁵

⁶¹ 惠棟對「錫」一字，同樣作了淵博、有趣的考據。包括了《孔氏正義》傳：「其時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游，《急就篇》：「棗、杏、瓜、棣、餛、飴、錫。」陸德明，《經典釋文》：「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曰：「張皇反，即乾餹也。」見《集釋》，頁388。

⁶² 引文俱見王士禛，《紅橋遊記》，收入《年譜》，頁21。

⁶³ 《年譜》，頁20-21。

⁶⁴ 《年譜》，頁23。

⁶⁵ 《年譜》，頁23。

四、對蘇東坡的認同

尤侗「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的說法，雖然有一定的客套成分，卻不是純然的飾辭。至少在揚州，王士禛尋幽訪勝的文化活動和文學記敘，確實為山川古蹟帶來了實質的貢獻。梅爾清對紅橋因為王士禛的傳頌而名垂青史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禪智寺的蘇軾殘碑，因為王的造訪和品題而重現生機，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在紅橋之外，隋帝國的殘跡、歐陽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揚州記敘中最常見的文化符碼。藉著這些眾所周知的象徵符號，士大夫階層建構了一個對揚州城的共同記憶，並得以超越時空的障礙，和這座古城千年的歷史流變中，最輝煌的銘記接軌。但在一些共享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碼外，我們發現個別的文人、士大夫，因為個人的特殊際遇和性情，常常會選擇某一組符碼或人物來投射自己的感懷。鬱鬱不得志的鄭板橋，在紅橋、平山堂外，特別偏好隋朝古塚、遺跡所蘊含的荒涼、滄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對盛世揚州的疏離。相形之下，才氣縱橫的王士禛，選用蘇軾來彰顯他對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時，不但反映了個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許，也顯示他企圖藉著對蘇軾的認同，來重新書寫這座歷史名城的文化系譜。⁶⁶

王士禛雖然出生在明崇禎年間，但明室覆亡時，他只有十一歲。他的整個仕宦生涯，完全是在清朝建國之後展開。他雖然和一些知名的前明遺臣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我們卻不能據此假設他必然會面臨到政治或種族認同的問題。這一點，我在下面還會進一步討論。這裡要強調的是，透過文化系譜的建立，或是對各朝各代名公鉅卿的認同，像王士禛這種處在政權交替時期的士大夫，其實可以很容易地跳脫政治、族姓的紛擾，經由歷史、文化的傳承，為自己當下的情境和存在，創設出更豐富的意義。

王士禛到揚州後第二年（順治十八年）的上元節，和友人一起遊覽平山堂，順便到城東北蜀岡上的上方禪智寺探訪蘇東坡寫的一塊殘碑。上方禪智寺一名竹

⁶⁶ 孫康宜教授也注意到蘇軾在王士禛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她認為王有一種「焦慮」，想和古代的巨擘及經典作家建立一種聯繫，一種平等化的「競爭」。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王士禛反對以朝代為基礎的門戶之見，他標舉唐詩，也推崇宋代詩人。他廣涉六朝之詩，也不反對明詩。孫康宜，〈典範詩人王漁洋〉，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553。

西寺，隋煬帝曾經夢到自己遊兜率天宮，聽彌勒佛說法，醒來後就把自己的離宮施捨為寺，即上方寺。⁶⁷ 宋元祐七年（1092），蘇軾知揚州時，和宗親蘇伯固陪同即將出使嶺南的李孝博，一起遊蜀岡。蘇軾寫了〈次韻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一詩，並刻在上方寺的石碑上。⁶⁸ 王士禎造訪時，上距蘇軾出掌揚州，已經近六百年，「寺荒廢，而碑復零落剝蝕於頽垣敗瓦間」。王士禎訪求到斷碑後，「拂拭出之，摩娑三嘆，如與公晤言，酬唱于當日」，並和其韻，刻石於斷碑之側：⁶⁹

昔出蜀岡道，黃葉鳴秋蟬。今來上方寺，綠萼破春煙。坦步寶帶側，延眺隋城巔。古剎龍象寂，殘碣蛛絲懸。緬思峨嵋人，文采真神仙。……空堂響人語，怖鴿飛聯翩。後遊慨今昔，憑弔當同然。⁷⁰

上方禪智寺在王士禎首次造訪時，已經破敗到鴿子聯翩飛舞，殘碑上也結滿了蜘蛛網，但卻絲毫不妨礙他對這位「文采真神仙」的先賢的仰慕之情。在摩娑三嘆的感懷之後，稱霸清初詩壇的王士禎，似乎不必遙想千古的風流，就可以進入蘇軾當年的世界，把酒言歡。

王士禎除了賦詩憑弔外，還將原碑的殘石放置在禪智寺的寺壁間。⁷¹ 此後四年內，他常常想將原碑「屏當補綴，俾還舊觀」，但一直沒有空處理。康熙四年冬天，王士禎確定自己即將內遷禮部，「行有日矣」，對修碑一事「耿耿于心」，特別在第二年春天命學生宗元鼎將東坡詩刻在禪智寺壁上。⁷²

王士禎上任後不久，特地前往傾頹的古寺尋訪破碑的舉動，贏得他的老友汪琬的讚揚：「奎影蟬聲懋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愛迷樓景，誰訪殘碑踣蜀岡。」⁷³ 如果不是出於對蘇東坡的特別情感，王士禎大概是不會捨樓景而踏蜀岡的。他在即將升遷到京城為官之際，猶念念不忘補綴殘碑的宿願，並終於在告別揚州前完成，可以進一步佐證他對蘇東坡的認同。

⁶⁷ 見惠棟為王士禎〈上方寺訪東坡先生石刻詩次韻〉所作的註釋。惠棟註，《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收入《四庫存目》，集部第226冊），卷一下，頁7b，總頁26。

⁶⁸ 〈蜀岡禪智寺唱和詩〉，見《漁洋山人集七種·六》，頁1b。

⁶⁹ 王巖，〈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見《漁洋山人集七種·六》，頁1a。王士禎，〈次蘇公韻〉，見《漁洋山人集七種·六》，頁3b。

⁷⁰ 王士禎，〈上方寺訪東坡先生石刻詩次韻〉，見《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一下，頁7a-b，總頁26。

⁷¹ 蔣寅，《征略》，頁59。

⁷² 王士禎，〈答碩公〉，見《漁洋山人集七種·六·蜀岡禪智寺唱和詩》，頁4b-5a。

⁷³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頁3b，總頁462。

這個時候，上方寺的住持是從靈隱寺來的碩揆上人。清明節當天，石碑刻成，王氏兄弟和碩揆上人賦詩紀事，冒辟疆、陳其年等諸名士唱和，成為一時文化盛事。江南一帶士人並將王士禎和碩揆間的唱和，比於蘇東坡和了元和尚的故事。⁷⁴

一方殘碑固然可以用作建立揚州文化系譜的介面，兄弟間的別離和仕途的挫折，也可以在蘇東坡的詩文和人生歷程中找到投射。康熙二年除夕，士禎將過去一年的詩作編次成卷，在序言的一開頭，就提到兒時和幾個哥哥在家鄉讀蘇東坡集，悲傷得不能終卷：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予每循覽，愴然不能終卷。⁷⁵

不過當初讀的時候雖然不能終卷，但因為並未體驗過離別之苦，所以「未知此語之可悲也」。等到弱冠以後，「以世網奔走四方，回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

⁷⁴ 蔣寅，《征略》，頁123-124。事實上，上方寺殘碑並不是王士禎在揚州五年間唯一修過的蘇東坡遺跡。他上任之後，四處泛舟遊覽，曾經過高郵的文游臺，產生了修葺殘臺的念頭。文郵臺在高郵城東，相傳蘇東坡曾與秦觀、孫覺等人同遊，論文飲酒於此。郡守因築臺名文游，以紀其勝。王士禎除了登臺賦詩，並發願重修故人勝游之地，在地方官紳的協助下，從順治十八年開始到康熙三年終於修成。在〈重修文游臺記〉中，王士禎追述了蘇軾貶謫後浪跡江淮的經過。並希望藉著故跡的修復，讓東坡的風流，在五、六百年後依然能映照流傳：「考公生平踪跡，多在江、淮，又嘗與孫莘老、秦少游、王定國輩遊處最善。而孫、秦二君子者，皆高郵人，故郵樂得公而顯。而文游臺在城東北里許，即公與三君子所嘗遊眺者也。……余以順治十七年來李廣陵，文書之暇，多泛小艇往來三十六湖之上，因登是臺而弔之。嗟其頽廢荒落，謀諸州守及州之士大夫，思所以修葺而振起之者，始辛丑迄甲辰，閱四歲三守而臺之工以成。方公泊三君子，以直道不容於世，放跡湖海，登是臺以嘯詠，發抒其無聊不平之氣。自宋及今，閱五六百載，所謂僉王者，其人與骨皆已朽，而斯臺巋然，公之風流照映於無窮，然則公不可謂不幸也。」《集釋》，頁354, 359。

⁷⁵ 〈癸卯詩卷自序〉，《文略》卷三，頁21a-b，總頁119。王士禎將自己兄弟兩人的感情和蘇軾、蘇轍兄弟作對比，是有充分理由的。蘇轍（1039-1112）出生時，長姊、長兄均已夭折，所以和大他兩歲多的仲兄蘇軾感情特別好。《宋史·蘇轍傳》說：「轍與兄（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曾棗莊，《蘇轍評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中，對蘇氏兄弟二人幼時一起讀書、成長的歷程，有詳細的描寫。見頁3-12。

後知兩蘇公之詩之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⁷⁶

兄弟別離，讓王士禎想到蘇軾、蘇轍兄弟感慨離合的應答之作。康熙三年，士禎因禮部磨勘案下獄，也馬上讓士禎想到蘇東坡的湖州詩案，⁷⁷並為自己不能像蘇轍那樣代兄赴闕訟冤感到愧疚：

家兄平地波瀾，魂飛湯火，不啻子瞻湖州詩案。而弟曾不能舍此雞肋，如昔子由赴闕訟冤，以身請代，而猶且飽食安居，偃仰在床，豈復可覩顏人世乎哉？⁷⁸

王士禎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也分享了王士禎對蘇氏兄弟的強烈認同：「念予兄弟即才具名位不逮兩蘇公，然其友愛同，其離索同，其不合時宜同，其輾轉困踣為流俗所指棄又無不同。」⁷⁹

王士禎服官揚州的經歷、在清初文壇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對蘇東坡的自我認同，很容易就建構出他和蘇軾在文化系譜上的傳承關係，並進而獲得其他人的認可。⁸⁰在這個建立認同和認可的過程中，禪智寺殘碑的探訪和唱和，扮演了重要

⁷⁶ 〈癸卯詩卷自序〉，《文略》卷三，頁21a-b，總頁119。

⁷⁷ 湖州詩案發生在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一般通稱「東坡烏臺詩案」。蘇軾在熙寧年間，因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新政，被排擠出朝。王安石罷相後，黨爭益發嚴重。元豐二年二月罷徐州任，改知湖州。四月底到任後，才三個月，就被朝廷派人逮捕。原因是他在〈湖州謝上表〉上寫了兩句牢騷文字，得罪了推行新法的人。這些人蒐集了蘇東坡的一些詩文，並加以註解，來坐實蘇東坡包藏禍心、怨望皇上、訕謗謾罵的罪名。這一件烏臺詩案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獄，蘇軾幾乎因此喪命。後來因為王安石等人的營救，才得以幸免。蘇轍也特地寫了〈為兄軾下獄上書〉給神宗皇帝，為從小相依為命的哥哥請命：「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詳見曾棗莊等著，《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17-23。

⁷⁸ 《同人集》卷四，頁79a-b，總頁173。

⁷⁹ 王士禎，《十笏草堂辛甲集》，卷首，〈拘幽集自序〉，引見蔣寅，《征略》，頁114。

⁸⁰ 嚴迪昌認為王士禎一生的詩作從來不曾超越出「大音希聲」的唐韻，他中年以後「越三唐而事兩宋」的說法，是為了要「權宜順應時風趨勢」。而所謂的時風趨勢，是指當時一些詩選的編輯者雅好蘇軾、黃庭堅等宋人的作品，王士禎因此「和光同塵」地與各方面詩藝奉持之人相周旋。見氏著，《清詩史》，頁449-450。但從我在這一節的敘述，可以看出嚴氏的說法，嚴重地偏離史實。王士禎對蘇東坡的愛好、認同，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的，在揚州任官時更發揮得淋漓盡致。說他中年開始，為了趨炎附勢而改宗宋詩，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說法。我們從士禎門人俞兆晟引用王晚年的夫子自道，說自己論詩凡數變，「少年初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也可以進一步印證他在揚州時，對唐宋的詩歌傳統，並不曾用時代作取捨的判準。王士禎，〈《漁洋詩話》序〉，收入

的功能。王巖在〈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裡，就首先將蘇、王二人等量齊觀：「先生政事不減蘇公，而文章風雅，遠被江淮，不減蘇公之在揚。」⁸¹ 被比爲了元和尚的碩揆，則對二人的共通之處，作了更淋漓盡致的闡述：

自坡公迄今六百餘年，何以獨至阮亭而始和之？阮亭文章詩詞，為當代所宗尚，與東坡同。其任揚州也，廉愛精敏，百姓食其德，與東坡同。見一善如己有，而獎訓士類，有古賢公卿下士之風，復與東坡同。雖古今時代不一，然究不以時代分古今也。

作爲一名講求因果輪迴的禪師，碩揆認爲士禎不僅和東坡精神相通，根本就是東坡的轉世：

阮亭初李揚時，即艤舟步往，尋公遺蹟。微阮亭至，則蘇碑已與寺俱毀。

苟非精神相通，微顯一致，何以若此？曾謂阮亭非髯後身乎？⁸²

碩揆這段爲唱和詩所作的闡釋文字，寫在康熙四年清明。王士禎在了卻綴補殘碑的宿願後，去了一趟如皋，參加冒辟疆的水繪園修禊，隨即從揚州束裝北上，到京師就任新職。碩揆的結論，無疑是爲他揚州任內所建立的文化系譜，作了最有力的背書。

五、交游

順治二年，王士禎十二歲時，南下的清軍用飛炮轟擊揚州城西北隅，攻陷東、西二城，並大肆屠殺。揚州從明萬曆以來所營造出的富甲天下的榮景，遭到慘重的打擊。⁸³ 王士禎在劫亂之後十五年前往揚州任官時，社會秩序雖然已經恢復，但下距鄭板橋賣畫揚州時（雍正元年，1723）⁸⁴ 鉅商雲集的榮景，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王士禎在揚州五年的交游和文化活動中，不見鹽商的蹤影，適足以說明此時物質生活的相對匱乏。

《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63），上冊，頁163。他在揚州時期的神韻詩，雖以唐音爲主要基礎，但也可以看到蘇軾、陸游等人的影響，確實反映了他自己說的博綜該洽，見張宇聲，〈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頁56-57。

⁸¹ 王巖，〈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漁洋山人集七種·六》，頁1b。

⁸² 釋元志（碩揆），〈唱和詩〉，《漁洋山人集七種·六》，頁8b-9a。

⁸³ 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77。

⁸⁴ 鄭燮從雍正元年起，展開「十載揚州作畫師」的生涯，可參考我在〈在城市中徬徨〉一文的討論。

但是揚州的交通樞紐地位，以及王士禎在文壇日漸竄起的聲名，卻使他迅速建立起一個包括遺民、文人、官員以及下層士人的交游網絡。這些人因為補官上京、罷官南歸、返鄉葬父或是旅遊、路過、專程造訪等各種理由，路過揚州。其中除了少數人像朱彝尊一樣，與王士禎錯身而過，⁸⁵ 其他多和他在不同的場合見面。

在官員中，汪琬和王士禎有極深的情誼，汪琬過訪，自不能等閑視之。根據蔣寅的考訂，汪琬在順治十八年秋天，從刑部員外郎一職罷官後返回蘇州故里，中間經過揚州，阻風逗留。王士禎得到消息，特地出城相迎：「蕪城暮雨聞君到，急訪扁舟出郭來。」⁸⁶ 從汪琬自己的記敘，我們可以想見眾人高談宴飲的場景：「朱筵接席坐，紫陌聯鑣騰。雄文誇藝苑，高論摧談僧。」⁸⁷ 在第三天的宴席上，王士禎因為「揚州之鶴甲天下」，而自己剛好養了十隻，就將其中兩隻送給汪琬，來襯托他耿介孤高的特質。汪琬原本固辭，在同席的冒辟疆、陳其年力勸下，欣然接受。⁸⁸

汪琬返回蘇州故里後，沒有閑置太久，第二年春天又補官上京。清明節後，再度路過揚州，和王士禎短暫會晤後，王士禎因公北上淮陰，邀請汪琬一起到邵伯湖泛舟，然後各奔前程。⁸⁹ 這個時候，王士禎雖然還沒有因為審案過嚴而遭到降級處分，但大概頗為公事煩心。在送汪琬入京的詩中，他除了追憶汪琬兩次路過揚州時，兩人在寒煙細雨中共遊的情景，以及贈鶴、賞梅的近事，也表達了無限的離情和感激之意：「淼淼江湖春水生，淮南風景過清明，故人恰向愁中至，感激真從難後平。竹外寒煙瓜步鎮，花時細雨廣陵城，謝公埭下通宵語，酒冷香殘十載情。」⁹⁰ 「南徐載鶴橫江去，西磧看花壓帽歸，此去故人京雒少，莫教遠道尺書稀。」⁹⁰

⁸⁵ 根據蔣寅的考訂，朱彝尊在康熙三年閏六月下旬往雲中謁見侍郎曹溶，道過廣陵，但因為王士禎剛好去南京，不克相見，留詩感懷。王在得到詩後，也立刻以詩相報。見蔣寅，《征略》，頁113。

⁸⁶ 蔣寅，《征略》，頁76。

⁸⁷ 汪琬，《揚州留別貽上二十八韻》，見《鈍翁前後類稿》卷三，頁4a，總頁462。

⁸⁸ 汪琬，《載鶴記》，收入《同人集》卷三，頁20a，總頁92。

⁸⁹ 蔣寅，《征略》，頁83-84。

⁹⁰ 王士禎，《送苕文之京二首》，見《漁洋詩集》卷一三，頁2a-b，總頁652。王在小註中，特別提到載鶴、探梅，「皆余與苕文近事」。

除了偶爾親自出訪老友外，⁹¹ 對像汪琬這樣在仕途遭到挫折的同儕，王士禎也從不怠慢。就在汪琬罷官南歸之後沒有多久，和王同一年考上進士的丘象升由翰林侍讀貶到瓊州府擔任通判，王在平山堂爲之餞行；丘象升在十五年後回憶起來，還有無限的感懷：「高會平山十五年，燕雲楚水各風煙。兩家兄弟還相憶，霜后持螯晚菊天。」⁹² 王士禎面對老友「夕貶潮陽路八千」的境遇，雖然有著人世滄桑的感觸，還是勉力予以道德上的勸勉：「學士文章洛下尊，嶺南此別愴離魂。舟浮瓊海于重浪，春到梨人第幾村」、「相逢寄語江陵子，放跡珠厓是主恩」。⁹³

王士禎雖然從二十多歲起，就展開了順遂的仕宦生涯，但他的交游圈卻未劃地自限，落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窠臼。在揚州五年期間，他或是主動出擊，在尋幽訪勝之際，對困居陋巷的下層文人施予援手；或是用誠意感動鄰近區域的文人，專程至揚州致意。

在這些往來的不仕文人中，丁胤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少習聲伎，對南曲有特別的造詣。由於居住在秦淮河畔，對妓院風流也知之甚詳。順治十八年，王士禎到南京時，就住在他家裡。他帶領王士禎漫游秦淮，並爲他解析曲中遺事，成爲漁洋《秦淮雜詩》的素材。⁹⁴ 丁胤是錢謙益的老友，由於他的慇懃和居間傳話，王、錢二人得以建立一段文字因緣。

相對於丁胤風流雅緻的生活模式和交游，邵潛大概更符合我們對布衣的想像。邵潛是通州處士，「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五十歲娶了第二位妻子，「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爲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西門」。這樣一個性情古怪傲慢，連自己的妻子都不屑一顧的窮酸書生，卻受到王士禎的抬愛。康熙四年，王赴如皋，專程造訪。由於邵潛居住的巷道過於狹窄，不容車騎，王特別下車徒步入蓬門。在這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的陋室中，他發現邵潛刻的書版佔滿了整個房間。邵爲了招待貴客，出市買酒，士禎幫他斟滿

⁹¹ 作過侍郎的李敬，是王士禎任官揚州前，在北京結識的忘年之交。順治十八年，李路過揚州，王親自造訪於舟中，討論當代詩人的成就。王士禎，〈李侍郎〉，收入《池北偶談》下冊，卷一三，頁317。

⁹² 丘象升，《南齋詩集》，引自蔣寅，《征略》，頁77。

⁹³ 王士禎，〈送丘曙戒侍講謫判瓊州兼寄姚子上推官二首〉，見《漁洋詩集》卷一一，頁3b，總頁639。

⁹⁴ 《年譜》，頁18。

酒杯，「盡歡而罷」。如皋縣令聽到王士禎造訪邵潛的消息後，立刻下令免除其徭役。⁹⁵

骨子裡仍有幾分年少輕狂氣質的王士禎，⁹⁶ 大概對邵潛的狂傲不馴，有特別的契合之感。在登門拜訪後，還特別邀請他參與在冒辟疆水繪園的修禊活動。⁹⁷

林古度 (1580-1666) 是著名的遺民詩人，和丁胤交游甚密。萬曆年間，他在北京結識了王士禎的先祖，一起討論寫詩的門徑。順治十八年，丁胤為王士禎導覽秦淮風光時，年過八十的林古度應邀作陪，見到了故人之後。王將自己的詩作送請林古度過目，林備極讚歎，認為他將家學門風發展到極致：「先生妙年高第，履官從政，如寶劍之出新型，瓊花之吐鮮萼，其一片精銳之力，森秀之才。」⁹⁸ 兩人雖然在年齡上相差了半個多世紀，但因為對彼此詩作的賞識，很快就建立起頻繁的互動關係。林幾次專程從南京到揚州拜訪王士禎，並參與了紅橋修禊和平山堂的宴集。

康熙三年，林古度將他從萬曆三十二年 (1604) 以來六十年的詩作，帶到揚州請王士禎刪定。王選了其中一百五六十首「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的作品。路過揚州的友人讀到王士禎為林古度揀選的作品，驚嘆道：「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子真茂之知己也。」第二年，王士禎在南京碰到林古度時，他兩眼已經失明，「垂涕而別」，不久後亡故。⁹⁹ 這位前明遺老，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結識了王士禎這位少年知己，畢生的心血之作，也因為王的品題而為當代人所矚目。¹⁰⁰

⁹⁵ 王士禎，〈邵潛〉，收入《池北偶談》下冊，卷一八，頁434。《居易錄》，頁150。

⁹⁶ 王士禎自己記載順治十八年，二十八歲時，有事於吳郡，處理完公事後，照例四處遊山玩水：「舟泊楓橋，過寒山寺，夜已曠黑，風雨雜遝。山人攝衣著屐，列炬登岸，徑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時以為狂。」見《年譜》，頁18。雖然比起張岱夜闌金山寺，在大殿中盛張燈火演戲的作為稍顯收斂，王士禎顯然對自己列炬登岸，半夜在名寺中題詩的行徑頗感自豪。張岱的記述見〈金山夜戲〉，收入《陶庵夢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86），卷一，頁10。

⁹⁷ 《年譜》，頁14。

⁹⁸ 見林古度為王士禎《入吳集》所寫的序，收入《漁洋山人集七種·五》，頁1b。

⁹⁹ 《池北偶談》下冊，卷一三，頁295。

¹⁰⁰ 同樣的意思，王士禎在《居易錄》中如此記載：「施愚山（閔章）見之曰：吾與林翁久游處，非君還不知其本色，乃如是，君之功林翁大矣。」王在刪揀時，特別挑選林早年的詩作，因而使得他的特色格外凸顯。見《居易錄》，頁150。

以王士禎此時在詩壇的地位，受到他讚揚的人，想必會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袞」的感覺，泰州布衣吳嘉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王在為另一位詩人汪楫的詩集所寫的序言中，對他如何經由汪的輾轉引介而得以認識吳嘉紀這位貧困隱晦的詩人，有動人的描繪：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居濱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虎蒙翳，猩鼯啼嘯，人跡盡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¹⁰¹

居住在這樣一個白天都不見人跡的濱海鹽鄉，即使空有詩名，如果不是因為名士的品評，吳的聲名大概永遠不會傳播到百里之外，甚至連他的家人和鄉親也不會了解：「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¹⁰² 經由汪楫的推薦，吳的詩才被曾任戶部侍郎的周亮工所知。周在讀完吳的《陋軒詩》後，許為近代第一，並立即刊刻。康熙二年初，周亮工路過揚州，將他請人刊刻的《陋軒詩》送給王士禎。¹⁰³ 王在寂靜的雪夜拈燈品讀後，自動幫他寫了序言，並在第二天遣人飛書致意：「一夕，雪甚，風籟窸窣，街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嘆，遂為其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¹⁰⁴ 吳嘉紀接到王的天外來函，「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¹⁰⁵

這些折節下交的故事，當然可以解釋成一種刻意的策略和姿態，以營造出氣度恢宏、兼納百川的公眾形象。但王歷歷如繪的動人描述，直到今天讀來，仍能充分感受到其中的誠意。¹⁰⁶ 個性上的慷慨寬厚和詩壇祭酒的鞏固地位，讓他可

¹⁰¹ 王士禎，〈悔齋詩集序〉，收入《文略》卷二，頁21a，總頁108。

¹⁰² 〈悔齋詩集序〉，收入《文略》卷二，頁21a，總頁108。

¹⁰³ 蔣寅，〈征略〉，頁77，74。

¹⁰⁴ 〈悔齋詩集序〉，收入《文略》卷二，頁21a，總頁108。

¹⁰⁵ 《居易錄》，頁152-153。

¹⁰⁶ 嚴迪昌認為王士禎不可能在揚州任官三年後才認識吳嘉紀，因此推斷他從一開始就對吳嘉紀存有輕慢之心，並進而引王在《分甘餘話》中的評論來證明他對吳的讚美果然是一種飾詞。見《清詩史》，頁134。《分甘餘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禎罷官之後的回憶，距離他和吳嘉紀初次結識已經超過四十年。王在晚年對吳的評價顯然已經有極大的轉變，認為他被引進揚州社交圈後，因為「與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漸失本色」、「其詩亦漸落，不終其為魏野楊樸。」見《分甘餘話》卷四，頁592。從王晚年的評論來論斷他早年的讚美，是一種不具誠意的掩飾之詞，顯然有失公允。事實上，王一開始對

以揮灑自如地以詩歌為橋樑，跨越階層、地域、城鄉的疆界，建立起一個以揚州為基地的交游網絡。

在官員和處士之外，王士禎與一些知名的明遺臣或遺民，也有程度不等的接觸。其中像是錢謙益、吳梅村，因為輩份、年齡的差距，和王士禎並沒有不拘形跡的密切交往，¹⁰⁷但都對他的成就讚譽備至。特別是錢謙益，不但在詩風上對王有極大的影響，對他詩壇盟主地位的奠定，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不過從蔣寅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兩人的交往曾經過一番曲折。王士禎初抵揚州時，雖與其他遺民頗多往來，但對錢謙益的負面形象卻有所忌憚。一直到第二年（1661），錢謙益八十歲生日時，透過丁胤的傳話，讓他感受到王士禎的善意與眷念，兩人才開始有良性的互動。錢首先幫《漁洋山人集》作序，又寫了一首五言古詩在扇面上，託丁胤交給王士禎。在附帶的信中，錢對王明確地表達了推崇的意思：「微斯人，其誰與歸？」「余八十昏忘，值貽上代興之日，……豈不有厚幸哉！」¹⁰⁸因為受到這樣的推許，所以之後每當有人攻擊錢謙益時，王士禎就出來加以維護，在往來書信中，也表達了對他的敬愛。但王士禎後來居官京師，地位日益崇隆，對錢謙益貳臣的惡名又愈發忌憚，開始盡力與他畫清界限，並對他的創作觀點多所批評。¹⁰⁹

王士禎對與錢謙益交往的遲疑、反覆，相當程度上是出於對社會與士人公論的顧忌，並不能反映他在政治認同上的立場。他和夙負清譽，名列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的往來，就說明了他並不畏懼和拒不仕清的明遺民建立緊密的私人情誼。

吳的賞識，就是因為他詩文的古澹高寒，晚年對吳的批評，也是因為一個「冰冷底吳野人」，被儕輩「弄做火熱」，喪失了野樸的本色。王在康熙二年讀了《陋軒詩》後，特地為新刻的詩集寫了序文，將吳詩比為「郊島」者流，嚴迪昌認為是一種貶抑，其實是誤讀了全文。王士禎正因為對當時流行的拾六朝牙慧、空飾詞藻的作法感到極度不滿，所以才會被吳「古澹高寒」的詩風所吸引：「披讀一過，古澹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殆郊島者流。近世之號為詩人者眾矣，擬拾漢魏，摶撙六朝，以獻酬標榜為名高，以類函韻藻為生活，此道羶穢榛久矣，如君白首藜藿，戰影窮海之濱，作為詩歌，托寄蕭遠，若不知有門以外事者，非夫樂天知命，何以至此？」王士禎，《陋軒詩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403冊，頁391。

¹⁰⁷ 對吳梅村，王士禎以師禮待之，在《居易錄》中提到：「吳梅村師謂予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詞人。」見《清代筆記小說》第66冊，頁157。

¹⁰⁸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頁2-6。王士禎在《年譜》中，也特別提到錢謙益在序言中「與君代興」的期許。頁19。

¹⁰⁹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頁7-21。

順治十八年，冒辟疆和朱克生一起到揚州拜訪王士禎，一行人飲於公署，酬唱到夜半：「王郎齋閣晚香焚，相對題詩坐夜分。」¹¹⁰ 碰到端午節慶或王士禎的生日，冒辟疆也經常遣人致送賀禮或賀儀。¹¹¹ 康熙四年春天，王士禎在公事之餘，參與了冒辟疆在水繪園中舉辦的修禊活動。¹¹² 四個晚上不眠不休地宴飲暢談，更說明了王和這位明遺民代表人物的情誼。

除了和在世的前朝名士維持良好的關係，王士禎也不吝對採取激烈抗清手段的貞烈之士加以頌揚。清兵南下時，被史可法任命為揚州知府的任民育全力拒敵，終以身殉。王在為任民育寫的小傳中，對他的殉城有著動人而戲劇性的描述：「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綦嚴。……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刀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櫪馬皆驚。」¹¹³ 對一個壯烈殉明的官員作這麼正面的描述，不但反映了時代氛圍的相對寬容，也顯示王可以自由出入兩種政治認同中而略無扞格。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士禎則記載了家鄉濟南新城一位張處士的生平概略：「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¹¹⁴ 這篇文章大概寫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張處士亡故之後，王的官職則是翰林院侍講學士。以這樣的身分公然讚揚一位誓不入城的處士，讓我們對清初的政治氣氛和王跨越疆界的特質，再一次留下深刻的印象。

冒辟疆也許正像梅爾清所說的那批遺民一樣，固守對明文化價值的信念，並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如紅橋修禊），來重建他們對晚明文化的想像。¹¹⁵ 但是對王士禎來說，政治認同的歧異顯然不是問題，而他和明遺民的交往，有多少是出於對明文化刻意的懷念、追憶或收編，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¹¹⁰ 這首詩是朱克生寫的〈同冒辟疆飲阮亭署中憶苕文西樵石臞〉，引見蔣寅，《征略》，頁78。

¹¹¹ 順治十八年端午，冒襄（辟疆）派兒子冒丹書專程從如皋送來賀禮。第二年、第三年八月，冒襄也分別致送賀儀和壽詩。康熙三年五月，陳其年赴揚州，冒辟疆託陳轉致冒妻製作的紈扇、約履等端午節禮。分見蔣寅，《征略》，頁84, 88, 109, 116。

¹¹² 《年譜》，頁24-25。

¹¹³ 王士禎，〈任民育揚定國傳〉，《文略》卷五，頁5a，總頁139。

¹¹⁴ 王士禎，〈張處士傳〉，《文略》卷五，頁21a-b，總頁147。

¹¹⁵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pp. 51-53.

雖然王的一位伯父王與允在甲申年「闔門自經」，而他自己順治十四年(1657)寫的四首〈秋柳詩〉也被某些人視為「弔明亡之作」，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明亡時才十一歲的王士禎，會像他交往的那些明遺民一樣，有政治認同的困擾。¹¹⁶ 另一方面，王雖不忌憚和明遺民交往，卻不意謂他天真地缺少政治敏感度。嚴迪昌就指出：「凡遺民野老們帶有濃重政治色彩的雅集活動絕不介入」。¹¹⁷ 張宇聲也認為：「漁洋在揚州與遺民詩人的交往中，往往稱論其詩藝，稱引一些寫景名句，而避開了那些政治傾向鮮明的詩作。」¹¹⁸ 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旦牽涉到敏感的政治立場問題，王士禎會謹慎地保持距離。但只要不跨越這條最後的紅色警戒線，他仍然可以自由地出入兩個不同的世界。他一方面和在北京一同參加科考，隨後仕宦各地的同儕及其他新朝官員，維持溫暖密切的情誼，一方面又和拒不仕清的名士、布衣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雖然他的神韻詩風和遺民詩人哀怨蒼涼、激楚悲慨的詩風迥然不同，卻不妨礙他們的傾心相交。¹¹⁹ 王士禎在不問出身、背景、立場的廣泛交游時，保持適切的取決和謹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據此而認為「漁洋山人的詩學學術交遊或唱和酬應活動，實在是多與權術心機相輔而行的」，¹²⁰ 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偏頗之說。¹²¹

作為清初詩壇的盟主和廣陵詞派的領袖，王士禎的交游圈中，自然也吸引了一些在詩詞戲曲上有特別興趣或成就的文人。李漁、尤侗等人前後來揚州向他致意。¹²² 但最引人注目的則是與名詞人陳維崧（其年，1625-1682）的交往。陳其

¹¹⁶ 嚴迪昌對這組詩的意涵有扼要的分析。他認為王士禎兄弟都是主動入仕新朝，而王在寫〈秋柳詩〉時，正向進士之路邁進，少年得志，毫無必要以「弔明亡」之題招惹是非。見《清詩史》，頁420-423。

¹¹⁷ 《清詩史》，頁428。

¹¹⁸ 張宇聲，〈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頁52。

¹¹⁹ 張宇聲，〈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頁52-53。

¹²⁰ 嚴迪昌，〈清詩史〉，頁430。

¹²¹ 嚴迪昌作這個論斷的主要證據是王士禎在《居易錄》中有一大段自述生平交遊的文字，其中提到的全是官宦鄉紳詩人，卻略而不提廣陵時期的布衣遺逸之交。見《清詩史》，頁429-430。從文章的前後脈絡來看，「庚子之官揚州，揚州衣冠幅輳，論交遍四方，又數之金陵、姑蘇、毘陵，所至多文章之友，從遊者亦眾」的表述方法，極為自然，絕無將眾多的從遊者和四方之交一一排列的必要。事實上，王在《居易錄》中其他地方，對他和丁胤、邵潛、林茂之、孫枝蔚、吳嘉紀、杜濬等遺民、布衣的交往，有頗詳細的記載，見頁149-154。晚年自撰的《年譜》，或自選的詩集中，也完全沒有抹煞掉與這些人的交往。嚴氏這種選擇式挾取證據的說法，實不具說服力。

¹²² 蔣寅，〈征略〉，頁97, 131。

年的父親陳貞慧，和冒辟疆同列為明末四公子。由於這樣的故人之情，陳得以和冒辟疆寵愛的男伶徐紫雲在水繪園結識、熱戀。冒辟疆得悉兩人的戀情後，慷慨地將紫雲送給陳其年作禮物，用來交換他的一百首詠梅絕句。陳因此和這位名動公卿的男伶雲郎，維持了十幾年的同性戀情。¹²³

陳其年和伶人紫雲的愛情，在當時江南的文化圈是一件眾所矚目的艷事。紫雲後來離開陳其年，結婚成家，不久去世。兩人的交往始末和文士的題詠，後來結集成《九青圖詠》與《雲郎小史》兩本小冊子，流傳於世。¹²⁴

王士禎對陳其年和歌郎紫雲的同性戀情當然知之甚詳。康熙四年和冒辟疆、邵潛、陳其年等人修禊水繪園時，王士禎特別要求用詩作交換紫雲捧硯：「余與諸名士修禊冒辟疆園，分體賦詩。余戲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

¹²³ Sophie Volpp (袁書非)，〈如食橄欖——十七世紀中國對男伶的文學消受〉，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頁291-293。

¹²⁴ Volpp，〈如食橄欖〉。《雲郎小史》為冒襄的後人冒廣生（鶴亭，1873-1959）所輯，將陳其年與紫雲交往的各種相關資料綴集成書。徐紫雲，字九青。陳其年在水繪園中和他相遇後，曾為之畫像，並四處請人題詠，成《九青圖詠》一卷。兩書俱收入張江裁（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1937年雙筆樓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冒襄在其年死後寫的悼亡詩中，還特別提到此事：「水繪詩千首，園林景物添，……選聲極豪髮，圖畫楚腰纖」，「其年密畫紫雲小像，遍求題詠成卷」，見冒襄，〈哭陳其年太史倡和詩〉，收入《同人集》卷九，頁41b，總頁396。

根據〈雲郎小史序〉，徐紫雲生於崇禎十七年（1644），死於康熙十四年（1675）。陳其年在順治十五年（1658）入水繪園讀書時與紫雲定情，康熙七年（1668）其年進京，攜紫雲同行。見張次溪，〈雲郎小史序〉，見《雲郎小史》，頁1a。〈九青小像〉一名〈雲郎出浴圖〉，為之題詠的有七十多人，包括冒襄、王士禎、林古度、吳嘉紀、孫枝蔚等知名的文人士大夫；詩詞一百五十多首。見《雲郎小史》，頁7a-b。此後這本書在雍正、乾隆、光緒年間都還有人翻刻、藏購、品題。由下列的相關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陳其年和紫雲的同性戀情是如何不斷被頌揚和渲染：「先生後舉鴻博官檢討，康熙壬戌卒於京師，今且五十年矣。忽有賈人子持此圖售諸市，余購得之。……乃裝潢而藏之，復為詩一章，書於卷末，時雍正辛亥夏五月也。」（《九青圖詠》，頁18a）「此卷吳公得諸市中，裝緝成卷，持贈金棕亭教授，棕亭轉以贈余。……今藏之篋中且十年矣，不知後日誰復得此者，願世世寶之，可耳。」（《九青圖詠》，頁19b-20a）「乾隆乙卯五月弢園侍讀倩廣陵羅山人聘重摹副本以藏之。原卷題詠燦如日星，迄今無人抄寫。嘉慶庚午，長夏暄暑，七里塘友人出觀是卷，囑為重錄於尾。……此後又附同聲館倡和雲郎詞三十首，……又卷端有百穫山農序一首。」（《九青圖詠》，頁19a）「《九青圖詠》（即《出浴圖題詠》）揚州舊有刻本，光緒中沈太侔覆刻入《拜鵲樓四種》中，余為補撰〈紫雲小傳〉。」（《雲郎小史》，頁8a）

者，冒歌兒，最姝麗，爲其年所眷。許之，余坐湘中閣立成七言古詩十章。」¹²⁵

冒辟疆爲了得到陳其年的百首絕句，將寵愛的歌童送給陳其年作禮物。其他的文人、士大夫爲了維持與陳其年這位名詞人的關係，對他和歌郎間的風流韻事，也不停地加以頌揚、渲染。¹²⁶ 在這一方面，王士禎和其他士大夫並沒有什麼差別。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和這位以男風知名於世的詩人間，卻維持了一種較其他往來文人更強烈、更濃郁的情感。兩人在描寫彼此的交往和感情時，也都使用了超乎尋常的表現手法。

王士禎初到揚州的第一、二年，陳其年就和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始庚子、辛丑間，余在維揚，日與王先生阮亭游。……日與覽平山、紅橋諸勝，酒酣樂作，仰而賦詩，頗極杯酒倡酬之盛。」¹²⁷ 此後，陳其年就不斷地往來於揚州、如皋與陽羨之間，或是幫冒辟疆傳送端午賀禮，或是前來慶賀王士禎的生日，再不然就是參與王的紅橋修禊或〈冶春詩〉的唱和。從「兩行小吏豔神仙，爭羨君侯斷腸句」、「玉山筵上頽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等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王的風采和才華的仰慕。¹²⁸

王士禎對和陳其年的相處，也充滿了依戀之情。康熙元年（1662），王士禎二十九歲生日時，陳其年到揚州流連三、四日，「明燭連茵，頗極纏綿之致」。¹²⁹ 這年冬天，王說自己「日坐愁城苦海中」，希望能得到冒辟疆的書信，並期盼冒辟疆的兒子能和陳其年一起來探視他：「其年、青若不來，虛我十許日夢想。上元前，能把臂妙絕！」¹³⁰ 康熙三年夏天，陳其年再度到揚州看望王士禎：「其兄在此流連，極歡，無日不相見。」¹³¹ 在王士禎廣泛的交游圈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陳其年那樣，和他維持如此頻繁、深刻的互動關係：「其年與弟交，若有夙因，其淡漠之情，纏綿之致，別後令人夢寐不忘，歲杪歸陽羨，幸必取道邗江，一申契闊。」¹³²

¹²⁵ 《年譜》，頁25。《漁洋詩話》，收入《清詩話》上冊，頁168。

¹²⁶ Volpp，〈如食橄欖〉，頁293。

¹²⁷ 陳維崧，〈《南芝堂集》序〉，引自蔣寅，《征略》，頁53。

¹²⁸ 《年譜》，頁23。

¹²⁹ 《同人集》卷四，頁74b，總頁170。

¹³⁰ 《同人集》卷四，頁78b，總頁172。

¹³¹ 《同人集》卷四，頁80a，總頁173。

¹³² 《同人集》卷四，頁76b，總頁171。

康熙四年，王士禛參加水繪園修禊後，束裝北返，結束在揚州五年的仕宦酬唱生涯。臨行之際，冒辟疆、陳其年等人相送於河岸，並且賦詩惜別。陳其年在詩中對兩人的情誼，作了更細膩傷感的描述：

念彼王瑯琊，于我夙所敦。目我為上流，憐我非寒門。對床啖茗粥，促坐數梨尊。當其纏綿時，能不銷人魂。憶昨曲水戲，款款情彌溫。十日九見詣，延眺窮郊園。……臨水傷情多，願契前達言。人生非麋鹿，焉得同朝昏。¹³³

詩文酬唱，固然往往借用一定的格套或誇張的修辭，將喜怒哀樂的情緒，作過度或程式化的陳述。但王士禛重複使用「纏綿之致」或「虛我夢想」、「夢寐不忘」的語句來描述兩人的交誼，卻顯然超過了他自己或一般酬唱文字中常見的格套。而陳其年的詩句，除了印證兩人的情投意合，更透露出無比的愛戀。在最後一首告別詩中，其年壓抑不住滿腔的傷痛和綿綿無絕的悵惘，追憶起兩人在揚州共同度過的輕狂歲月。這些美好的回憶，讓一生為多情所困的陳其年，更無法接受故人在秋涼時節所帶來的訊息：

王君三十何堂堂，出李維揚耀朱襖。兩人相見便抵掌，坐上狂歌歌自若。馬稍清談街鼓動，哀絲豪竹春燈落。作官祇辦設茗荈，對客何曾噉蒜酪。六年游處無事無，口不能言記猶昨。今秋七月涼風盛，王君告我適京洛。雲帆破浪誰不羨，況復同舟載花萼。嗟余一生情苦多，別人每作數日惡。矧君與我比膠漆，此意誰能喻輕薄。昔游翻悔識君非，茫茫從此無歸著。¹³⁴

王士禛認為他和陳其年的交往，「若有夙因」。陳則認為六年無事不與的交往，讓兩人建立了如膠似漆的感情。一般的別離，也許帶來短暫的傷痛。但他對王君阮亭的用情之深，反教他後悔起「相見便抵掌」以來，相知相惜的種種因緣。

「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的王士禛，固然可以和陳其年建立纏綿悱惻的情誼，卻未必是陳其年所期待的那種強烈的同性戀情。但另一方面，陳其年天下皆知的同性戀情，卻沒有對二人的交往帶來任何障礙。陳雖較王年長十歲，但和父執輩的冒辟疆或七、八十歲的錢謙益、吳梅村、邵潛、林古度比起來，在年齡、氣質上，顯然更容易和王士禛建立起純粹酬唱之外的私密情誼。

¹³³ 《同人集》卷七，頁3a-b，總頁286。

¹³⁴ 陳維崧，〈贈別王主客阮亭〉，見《湖海樓詩集》（收入《陳迦陵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二，頁254-255。

六、小結

作為一名推官，王士禎「公正嚴肅、不畏強禦」，給人一種立場堅定、是非判然的森嚴之感。但一旦走出這種特定的情境，王士禎卻是一個最能打破對立，超越藩籬、疆界的浪漫詩人和風流名士。對詩文、酬唱、宴飲、遊覽的喜好，讓他可以超越政治認同，以及朝代、地域、階層、年齡、城鄉、貴賤和性向的差異，建立一個以揚州為基地的交游網絡。這種勇於跨越疆界的個性和寬廣的交游圈，對他建立全國性的聲名，顯然大有助益。¹³⁵

王士禎才華洋溢，人生面向豐富，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是一個典型的「圓型人物」(round character)。我們當然不能用他的生活經驗來概括那些個性、才具平庸的文人、士大夫——所謂的「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¹³⁶ 但和冒襄、袁枚或鄭板橋一樣，王士禎的生活經驗提供了極佳的例證，讓我們能據以重建一個和現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風貌和生活型態。在這個和現代世界斷裂的文化氛圍中，年輕熱情的詩人王士禎不僅成功地履踐了作為士人、儒生的現世使命，更以他日夜浸淫於其中的詩歌、文化傳統為基礎，跨越了各種疆界，營造出豐富而為人傳頌的生命歷程。透過王的記述和惠棟等乾嘉學者的考據，我們不但得以想像暮春三月，揚州城繁花盛開的景象，更找到了一個進入明清士大夫文化世界的津渡。

¹³⁵ 蔣寅特別從王士禎和江南遺民所建立的關係著眼，分析了揚州五年的經歷，在王士禎一生仕途中所扮演的關鍵性地位：「揚州的仕宦經歷，沒有給王漁洋增加多少政治資本，但他贏得了江南遺民詩人群的支持，這是他日後仕途順達和聲名顯赫的重要資本。江南遺民詩人群強大的輿論背景，對於他贏得當世第一的詩名，並藉此進入翰林院，走向文壇的中心，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蔣寅，〈王士禎與江南遺民詩人群〉，發表於「王士禎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5月27日）。

¹³⁶ 我在此借用的是英國小說家 E. M. Forster 的概念。Forster 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可以分成扁平和圓形兩種。扁平人物「有時被稱為類型或漫畫人物」，「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真正的扁平人物十分單純，用一個句子就可使他形貌畢現」。圓形人物則無法用一個簡單的語句描繪殆盡，他們往往變化不斷，繁複多變。Forster 此處指的雖然是小說中的人物，但我覺得這套觀念對我們用來研究歷史上的人物也極具啟發性。在對歷史人物——特別是一些重要的人物——進行解釋或重建時，如何避免掉入類型化的窠臼，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Edward Morgan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原書未見，我此處用的是中文譯本。見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志文出版社，1973），頁92-94。

一旦穿透了由精鍊的文字和符碼所建構的迷障，進入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堂奧，我們就會發現在面對這些複雜的「圓型人物」時，傳統的分析範疇或學術取徑——不論是學術史、思想史、政治史或文學史——之不足。這些專精的學術視野，固然解決了各個領域內的技術性問題，也對明清士大夫的某些面向做了深入精密的剖析，但也同時模糊了這些士大夫的整體面貌，將淋漓飽滿的人物切割成斷裂的單元。生活史的研究看似細瑣，卻往往能夠提供一個完整的橫切面和統合點，來重新架構一套具有特色的傳統文化風貌。當「士大夫文化」一詞被廣泛、普遍的使用，卻鮮少人願意停下來，想一想士大夫文化中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麼時，我們對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細節的描述，也許就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本文於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七日通過刊登）

後記

這篇文章曾在中研院史語所和文哲所的討論會上報告，我要特別謝謝胡曉真教授和許多同事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我能據以加強文中的某些論點。我也要謝謝王鴻泰教授和郭忠豪先生在資料蒐集上給予的協助。同時十分感謝兩位審查人仔細地讀完全文，提供了許多具體的修改建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士禎，〈陋軒詩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403冊。
- 王士禎，《分甘餘話》，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870冊。
-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
- 王士禎，《居易錄》，收入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66冊。
- 王士禎，《漁洋山人文略》，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第54冊。
- 王士禎，《漁洋山人集七種》，乾隆年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王士禎，《漁洋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部第226冊。
- 王士禎，《漁洋詩話》，收入《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63，上冊。
- 王士禎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王士禎著，孫言誠點校，《王士禎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
- 王士禎著，惠棟註，《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6冊。
- 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汪琬，《鈍翁前後類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7冊。
- 金鎮，《揚州府志》，引自王士禎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冊。
- 冒廣生輯，《雲郎小史》，收入張江裁（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1937年雙肇樓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冒襄（辟疆），《同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
- 張岱，《陶庵夢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86。
- 陳維崧，《九青圖詠》，收入張江裁（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

李孝悌

陳維崧，《湖海樓詩集》，收入《陳迦陵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二、近人論著

Volpp, Sophie (袁書非)

- 2002 〈如食橄欖——十七世紀中國對男伶的文學消受〉，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振忠

- 1996 《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

王鴻泰

- 1999 〈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收入《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
- 2002 〈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發表於「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紐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待刊。

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著，李文彬譯

- 1973 《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志文出版社。

巫仁恕

- 2003 〈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87-143。

李孝悌

- 2002 〈袁枚與十八世紀中國傳統中的自由〉，收入《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
- 2005 〈在城市中徬徨：鄭板橋的盛世浮生〉，收入《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即將出版。

李康化

- 2001 《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孫康宜

- 2002 〈典範詩人王漁洋〉，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徐振貴

- 1995 〈趙執信與王士禎詩及詩論評辨〉，《齊魯學刊》1995.2：91-96。

張少康

- 1995 〈董其昌的畫論和王漁洋的詩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2：43-46。

張宇聲

- 1996 〈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淄博師專學報》1996.1。

張江裁（次溪）輯

- 1937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雙肇樓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曾棗莊

- 1995 《蘇轍評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曾棗莊等

- 2001 《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劉錚雲

- 1993 〈「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75-240。

蔣寅

- 1996 〈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文學遺產》1996.2：91-99。
2001a 《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b 《王漁洋事跡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 〈王士禎與江南遺民詩人群〉，發表於「王士禎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5月27日。

嚴迪昌

- 1998 《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Meyer-Fong, Tobie（梅爾清）

- 1999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0.1: 49-84. 董建中譯，〈綠楊城郭是揚州——清初揚州紅橋成名散論〉，《清史研究》2001.4。
2003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leasures of A Gentry-Literatus: Wang Shizhen in Yangzhou, 1660-1665

Hsiao-ti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ang Shizhen was leader of the literati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Wang's follower, and author of his biography, describes Wang as the most celebrated poet of the age-- a literary role that he retained for several decades; this description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iews commonly held by Wang's contemporaries. In recent studies, Wang's leading rol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early Qing period, as well as hi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s'u* in the Yangzhou school, continues to be the focus of scholarly research in China. As Wang was such a renowned writer, it is but natural for scholars to discuss Wang's achievements primarily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For historians, however, Wang's voluminous publications of poetry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fer a rich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Tobie Meyer-Fong's work demonstrates this point very well. She analyzes in detail how Wang Shizhen acquired prestige through various cultur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his travels in the Jiangnan area. Meanwhile, Yangzhou owed Wang its rise in reputation as a city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 to study the lives of gentry/literati in the Jiangnan area during the early Q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vents of Wang's five-year career as an official in Yangzhou. The topics to be explored include Wang's religious beliefs, his diligent efforts and frustrating setbacks as a junior official, his alternating role as official and poet, as well as his wide social networks with Ming loyalists, poets without title or degree, and his fellow Qing bureaucrats. I will also discuss Wang's daily lif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his reminiscences of the Yangzhou and Jiangnan landscapes. With details of his everyday life in hand, I aim to provide a fresh perspective on elite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reover, it is my belief that the rich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of traditional gentry/literati like Wang will enable us to reconstruct cultural features and life styl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we see in the modern world today.

Keywords: Wang Shizhen, Yangzhou, elite cultur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leasures